

再多做一點點： 共創一個友善參與、協力工作的學會

郭佩宜 | 台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第 31 屆理事長

猶記得菜鳥時，曾「旁聽」學會的年度會員大會，那次會議討論了改名的重大議題，除了「台灣」與「中國」的身分認同之外，也涉及了「人類學」與「民族學」的學術差異。各方折衝的結果，大會決議將「中國民族學會」改名為「台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」。彼時為 2005 年，感覺學會是長輩們的組織，會員人數不多，距離自己很遙遠，沒什麼興趣加入。殊不知幾年後因緣際會，進入學會的祕書處擔任祕書，與幾位同仁一起籌劃研討會型態的年會、並將學會通訊轉型為《人類學視界》（2007～），我才開始認識在內政部人民團體法規範下的學會組織運作，思考建制化學術社群存在的意義與功能，以及限制。

當時有一群熱心的青年學者貢獻文章給《人類學視界》，開始集體的科普寫作，並在 2009 年某次籌劃稿件的聚會中，有感於半年一期、學會內部刊物的紙本《人類學視界》還不足以達成強化台灣人類學與社會的連結、以及同儕之間交流合作的目標，決定另外成立「芭樂人類學」部落格，以每週一篇文章的更新頻率與社會對話。

隨著世代交替，我們這輩的人類學者也開始陸續當選學會理事，共同參與了台灣人類學界的雙軌發展——在正式的學會組織內建言與服務，同時在體制外透過芭樂人類學等平台書寫實踐。2021 年下旬上任的這一屆（第 31 屆）理事會相當年輕，幾乎都是多年來在不同路徑積極參與的活力學者。

猶記得剛到學會工作時，理監事會多半在中研院活動中心的中餐廳 VIP 室舉行，在座都是資深長輩，學會事務不多，比較不像是個會議，而是在大圓桌上吃飯，聆聽前輩們交談。十年後的現在，理事會樣貌截然不同，「沒有大人」，青壯世代的同儕們在 google meet 討論會務，輕鬆愉快。

人類學界轉變了，學會轉變了，我們的角色也轉變了。學會在多年來的奠基之下，運作良好，我們除了守成之外，還能再多做點什麼？

或許我們可以在幾個方向上再多做一點點，以接近社群共好的理想。例如年會是建立「社群感」的好方式，學術研究的發表與討論是主軸，但我們可以藉由這聚會促進更多交流的可能、創造更多一同想像的空間，也讓初來乍到的朋友覺得有趣且歡迎參與。因此近年除了傳統 panel 場次，也開放自組論壇形式的討論。2022 年「人類學好南」年會於中山大學西灣學院舉行，這次年會更設計了新書發表短講、以及實驗 open space 的非正式場次，歡迎大家把剛冒出芽的新課題不吝拋出、現場嘗試揪團。

學術社群內部不同單位間需要更多的交流，學會可作為平台，促進橫向連結，創造合作以及資源共享的可能。我們已於 2022 年 8 月底邀請學會的團體會員單位代表聚會，尤其針對人才培育的合作交換意見。另一方面，跨世代的傳承與參與對學術社群也很重要，這幾年有不少前輩學者退休，更讓我們意識到學會可加強承先啟後的工作。我們兵分兩路，一方面啟動台灣人類學史口述歷史計畫，邀請青年學者訪談自己的老師輩學者，或進行跨世代對話，透過他們的眼睛，從不同視角切入，回顧台灣人類學多元繽紛的發展歷程，共同建構學史。另一方面則邀請新進的青年學者書寫自己的研究，讓社群成員彼此認識，也呈現新興的研究課題、以及新生代對台灣人類學的不同想像及展望。

《人類學視界》作為學會的通訊刊物，將以前述工作為新的策劃重點，除人類學界的讀者之外，相信也是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界有興趣的記錄。另一方面，學會的活動以及精采的文章，也須透過數位傳播，社群媒體的經營也是一項重要工作。

同時間，台灣與世界的連結也是作為社群代表的學會需持續耕耘的向度。除了延續過去幾年與日本文化人類學會的交流，我們也更積極參與世界人類學的組織，包括參與相關 COVID-19 的研究分享活動、及推薦台灣主要人類學研究期刊的論文至世界人類學的平台發表。在烏克蘭遭受俄羅斯軍事入侵後，全球人類學組織紛紛發文聲援，我們也快速響應。

無論是年會的籌劃、國內人類學相關系所交流平台的建立、台灣人類學史的傳承與匯整、青年世代的培育及參與、數位媒介的經營和延展、或國際學術社群連結的強化，事務繁多，需要大家一起承擔。本屆秘書處

擴大編制，除負責統籌的秘書長（趙恩潔）之外，新增四位副秘書長，分別負責國際交流（林育生）、歷史傳承（劉子愷）、青年參與（謝竹雯）以及數位世界（李梅君），而《人類學視界》則由鄭瑋寧擔任主編，負責改版的重任。感謝秘書處夥伴們的熱情付出，以及理監事們的協力，還有義務訪談與撰稿、以及慷慨受訪分享的學界前輩與朋友們。

回想當初，曾經以為學會距離自己很遙遠，希望現在的人類學老師與學生們已有不同的感受。學會是為大家服務的組織，也是個大家一起工作的團體，讓我們共同建構一個跨世代協力、友善而開放的人類學社群。



2022 年台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年會開幕論壇
（照片提供：年會工作團隊）